



【日】松本重治
曹振威 沈中琦 等译

上海时代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时代

〔日〕 松本重治

曹振威 沈中琦 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时代 / [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58-0176-7

I. 上… II. ①松…②曹…③沈… III. ①抗日战争—中日关系—史料②七·七事变—史料 IV.
D829.313 K265.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2096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张 懿

上海时代

[日] 松本重治 著

曹振威 沈中琦等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22.25 字数 555,000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0176-7/K·32

定价: 45.00 元

出版说明

《上海时代》是日本已故著名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松本重治的回忆录。1932年至1938年底，作者以日本联合通讯社（后改组为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身份来上海工作。全书以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的进程为主题，对作者亲身经历、直接参与或亲自与闻的一系列政治、外交活动的情景，作了详细的追述，由于其独特的史料价值，经常为中日关系史研究者所征引。囿于作者的政治态度、历史观念及其他一些因素，本书对中日关系史上诸多史事、人物的回顾与评述，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其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地理区域的概念表述亦多不脱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所给予的偏见甚至是歪曲的影响，有些职官制度的名称还有混淆使用的问题。为保存原貌以资参考，凡此类文字一般都不加删节和改动，有必要加以说明的，则以译者注的形式予以表明。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年12月

《上海时代》：回忆和反思

1930 年代的日本与中国

——松本重治对华回忆录中译本序说

余子道

日本已故著名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松本重治晚年撰写的《上海时代》，是他的几部回忆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篇章。这部蕴涵着回忆与反思双重意义的书著，记叙了上个世纪30年代，作者在上海从事新闻通讯事业和政治外交活动的历历往事，再现了那个危疑震撼的年代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画卷。它在政治上和文化、学术上的价值，自然是无可置疑。在《上海时代》问世近30年之后，终于以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首次面世，与中国读者见面；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里说的“上海时代”，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揭开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帷幕，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世界正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战争阴云笼罩全球。以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为标志的世界政治秩序，正日甚一日地遭受着德国和日本两个军国主义国家的挑战，而一步步地走向解体。世界各大国从各自的目的出发，先后走上了或正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路。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同声相应，相互激荡。两大革命洪流汇成为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成为30年代的时代主流而被载入史册。《上海时代》展现的虽然不过是这个时代狂潮中的几阵浪花，但却折射出特定的时代风云的变幻，让人们透视到历史脉搏的跳动。

《上海时代》展现的那个年代的历史波涛，离开今天已有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却以强烈的影响力和不同的色彩，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许多亲历过那段历史，曾经以各种不同的角色登上了那硝烟弥漫、充满着刀光剑影的历史舞台的活动家，更是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思念、评说和研究。松本重治作为当时日本在国际新闻通讯事业和政治外交领域一个十分活跃的人士，他深深地介入和参与了许多重要国际事务，特别是参与了对华政治、外交和谋略工作，说到底，是那个时期日本侵华政策的积极鼓吹者，是对华情报工作和谋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看来，松本重治对这段历史颇为重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上海时代……是我人生的一个亮点。”他以自己的历史观和对上个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的认知，于70年代重新审视这段令他难以忘怀的经历，以新闻记者特有的笔法，娓娓诉说往事，字里行间每每发出深深的感慨。作者先后断断续续地花了八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如果说，这是作者倾注了极大心血而完成的一部忆述，大概是言不为过的。

松本重治是日本大阪人，出身在一个社会地位显赫的名门望族，是明治元勋松方正义的孙儿，乃父松藏曾任日本九州电气铁道株式会社社长。松本重治1923年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升入该校研究生院攻读法理学专业。1924年1月至1927年10月负笈美国和西欧，先后就读耶鲁大学、日内瓦大学等校，留学期间萌发了当一名国际记者的志向。1928年1月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为“美

国讲座”课程当助教。1931年10月至11月，首次来上海，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会议。1932年12月起，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长，常驻上海。1935年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改称上海分社，任分社社长。同年12月，日本同盟通讯社成立，1936年1月1日，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改为同盟社上海分社，任分社社长。1938年1月1日，同盟社上海分社改组升格为华中华南总分社，升任总分社社长，总管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以及香港等各大中心城市的同盟社业务。1939年1月起调回东京，历任同盟社编辑局局长、常务理事等职。1940年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时，外相松冈洋右曾力邀松本重治出任日本驻美大使，但为其本人所婉拒。二次大战结束后，1952年至1970年出任日本美国学会会长，1952年至1988年，任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专务理事、理事长等职。1989年1月去世。

成长在大正与昭和时代日本主流社会上层的松本重治，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即开始在学界、新闻界崭露头角；并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而在财界、政界和新闻界拥有广泛的人脉。自1932年冬被派驻上海后，在不算短暂的六年时间里，跻身中国的上流社会和国民党党政各界，活跃在世界各大国派驻在沪的人士之中，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与交往，成为中日关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他充当的这种角色，日本人士曾经有过恰当的评述。抗战初期，参与对汪精卫诱降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原“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他的《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里说道：“松本重治，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因其地位和名望，被称为民间大使……特别使他受到重视的是他与新兴势力近卫文磨集团的关系，他是近卫文磨的智囊之一和其私人驻华代表。”日本历史学者藤井志津枝在《日本对华“诱和”与其参谋本部》一文中也写道：“松本重治是有名的记者，……在财政、文化界均有深广的人脉。这时他又是近卫首相（第一次近卫内阁）的智囊‘昭



和研究会’的一员。”“他……活跃在日本高层要人之间，是位超派阀的重量级人物。”

撰写《上海时代》这部回忆录，是松本重治晚年的一大心愿，他为此倾注心血，下了很大的功力。他的写作态度也值得赞赏。正如在本书《序章》中表明的：“把我在当地感受到的当时的情景从我的视点来描述，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我的回忆也并不是学术性的总结。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我的回忆也许能成为研究的资料。”为了写作这部书，作者查阅、考订了大量史料，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三铃书房出版的大型多卷本资料集《现代史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文件》，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等。参阅、对照了同时代日本政界有关人物撰写的回忆录，其中有堀内干城（曾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驻上海总领事）的《在中国的暴风雨中》，石射猪太郎（先后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等职）的《外交官的一生》，西义显的《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今井武夫（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副参谋长等职）的《中国事变的回忆》，神尾茂（曾参与对华秘密诱和工作）的《香港回忆》，犬养健（曾任日本国会议员）的《扬子江还在奔流》，有田八郎（曾任日本驻华大使、外务大臣）的《人称傻子——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等等。同时，作者还查阅了当时的一部分报刊及电讯，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联合通讯社和同盟社当时从上海发出的一部分电讯文稿档案，以及日本外务省有关的工作报告。为了核实一些史实，探究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作者还与一些当事人作过交谈，如西义显、犬养健、伊藤武雄、何廉、邵毓麟、高宗武、董显光、埃德加·斯诺、钱塞拉、苗剑秋等人，其中也有当事人的后代如战前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的儿子有吉正等等。此外，矢部贞知编的《近卫文麿》，松冈洋右传记刊行会编的《松冈洋右》，日

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编的《船津辰一郎》，同盟社史刊行会编的《通讯社史》，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岛田俊彦著的《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三卷，上村伸一著的《日本外交史》等史书，作者亦曾予以充分的参考和运用。

《上海时代》主要是一部政治和外交回忆录，又兼具新闻工作回忆录的特色。书中每每以浓墨重彩描写30年代许多大权在握的中方官僚、军阀、财阀、买办、报业巨头、学术名流和著名记者，日本在华的少壮派军人、大陆浪人、陆海军长官，更多的则是活跃在外交战线上足智多谋的资深官员、谈判高手、情报专家等等人物；有头有脸，更富有各色人物的思想、心态和性格。从这方面说，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本人物掠影录。全书以叙为主，夹叙夹议，于史事的回顾记述中倾诉了对历史的深沉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完全是作者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点来进行的。以此而言，本书也可归属于历史反思录一类的著作。

二

作为一部政治和外交回忆录，《上海时代》记述的是作者1932年底至1938年底在华工作期间，亲身经历、直接参与或亲自与闻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外交活动的情景。其中特别是关于中日关系的记述，作者不惜篇幅，重彩浓墨，构成为贯串全书的主题和基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把本书称作为一部关于30年代中日关系的回忆录，似乎也是恰当的。

在回忆录原书上册，作者首先追述了曾亲历的与中日关系有着特别深切关系的两次太平洋会议：1929年日本京都第三届太平洋会议和1931年上海第四届太平洋会议。1932年夏，松本重治受到日本联合通讯社两巨头岩永裕吉和古野依之助的赏识，被邀请加入该社行列，于同年冬派驻上海。这时，“一·二八”事变已告



结束，他没有来得及赶上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挑起的这场战争，在其书里记述了经过第一次淞沪抗战洗礼的上海之种种景象：中国民众高涨的抗日怒潮，日本人在上海的尴尬处境，日本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微妙变化，战后上海新闻战线中、日以及各国势力的较量等等。作为东方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汇聚东西方各国许多来华人士，构成小小的且颇为典型的“国际社会”，以英国在沪上层人士为主的“上海俱乐部”，以法国上层人士为主，却更具国际性的“法兰西俱乐部”，和以美国上层人士及亲美或知美的中国财界名流为主的“罗塔里俱乐部”，可说是上海“国际社会”的缩影。作者来沪不久就融入这几个场所，在书中素描式记述了此中情形，尤其是穿梭其中的“民间外交”更引人注目。参加“上海俱乐部”的日本籍会员只有两个人，除日本在华纺织联合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以外，就是作者松本重治，可见他的记载就更有意思了。在正式的外交界，作者着重忆述了与几个大国驻华大使的访谈和交往。英国前后三任大使贾德干、许阁森和卡尔，意大利驻华大使科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无不在作者的笔下一个个展现，从他们的交谈中道出了当时各国政府对远东国际关系的认识及其对华、对日政策。

松本重治当年被派驻上海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利用其新闻通讯社负责者的身份和其他有利条件，广交国际朋友，互通信息情报，扩大日本对各国的影响，努力寻求和结交各国人士中的亲日势力。如作者说：“在30年代中期，上海越来越成为东亚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一大中心。”“同时也是中国与各国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沟通场所。”“当时，各方学者、作家、记者等等，都纷纷涌到了上海。”他利用“上海俱乐部”等场所，竭力联络那些同情与支持日本的外国人士，尤其是注重结交英国人，路透社的钱塞拉、大富商哥济库兄弟、汉斯·贝尔舒坦因等人都为其知交。比较而言，他的美国友人少些；在他看来，中国问题

始终是日美关系中争执的焦点，从而把结交的重点置于英方，这是不足为奇的。

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发动长城战役，侵占热河和冀东，开始了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新阶段。华北地区遂成为继东北之后日本侵华新的重点目标。作者怀着对“满洲”、华北进行实地考察，以评判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天津驻屯军政策行动之利弊得失的目的，于1933年夏初次出访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天津、北平等城市。在书中，一一回顾了他的考察见闻，录下“满洲国通讯社”负责人里见甫、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次长岸信介、南开大学教授何廉、联合通讯社北平支局长山上正义、美国驻中国公使馆一等书记官索尔兹贝利、苏联塔斯社驻北平记者斯雷巴克等人对中日关系和远东局势的见解，也诉说了作者本人对于“满洲国”问题和华北问题的与日本军方不同的主张，显现出他那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对国际关系的深邃的洞察力。

从1933年长城战役结束和《塘沽协定》签订，到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只不过是短短的两年半左右时间，却是战前中日关系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就在这时，松本重治愈来愈在更深入的程度和更高的层次上进入了对华的政治外交活动。他以上海、南京为主要舞台，广泛采集和迅速掌握中日两国许多重要情报和信息，亲历中日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与闻两国政府之间多次重要外交谈判的内幕……这一切在本书中都有种种追忆，有不少叙述颇为具体和细腻。作者详尽地回顾蒋、汪合作的南京国民政府，以一个日本观察家的眼光透视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孙科、宋子文等等国民党当局高层人士，对日交涉的重要负责人黄郛、王宠惠、唐有壬、高宗武等人的政治理念，对日态度和在谈判中的表现。在他的笔下，蒋介石是一个专制独裁主义者，而汪精卫则是一个共和民主主义者；蒋介石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汪精卫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视线中，蒋汪合



作的政治基础是“攘外必先安内”路线下谋求国家统一的目标；而蒋汪政府实行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即以退让妥协求和平的对日政策，正在于为了达到上述共同目标。作者认为“蒋汪两雄都一致认为由于中国准备不充分，因此要尽量避免日中的全面冲突”。作者着力写到汪精卫主持下的以唐有壬、高宗武为主干的对日交涉班子的频繁活动和“出色表现”，中日之间关于关内外“通邮”、“通车”、“长城线设置税关”的谈判，修改对日关税税则，以及整理中日两国间旧债谈判的情形，关于“藏本事件”的经过及外交当局的处理情形，等等。

日本冈田内阁于1934年7月登台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鼓吹的所谓“协调外交”被炒得火热。广田一次次地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装饰成满面笑脸，被当时舆论界戏称为“微笑外交”而闻名于一时。广田弘毅与其前任内田康哉“焦土外交”不同，改换手法，提出对华“亲善”政策，以及相应的一连串外交动作，与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在“睦邻敦交”名义下推行的媚日妥协外交相互呼应，演绎为两国当局间一幕幕所谓“调整国交”的政治外交活剧。松本重治的回忆录费了不少笔墨，重现当年这多幕活剧的情景，读来颇使人有身历其境的感受。作者披露了《天羽声明》的背景和由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为这一声明赶赴南京与汪精卫举行会谈的内情，中国各界对《天羽声明》的“猛烈的批判”，英、美等国对“声明”的抵制以及日本外务省采取的“灭火”工作。作者在书中以正面的积极的评价，详细记述了当年两国当局所谓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举措：汪精卫从1934年9月到12月先后三次与日本公使有吉明进行会谈；蒋介石发表（署名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政策性文章；广田弘毅1935年1月22日于日本议会发表外交方针演说；在这前一天汪精卫与唐有壬会见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连续会谈两天；1月29日，蒋介石破例会见日本驻华武

官铃木美通，汪精卫与有吉明举行会谈；次日蒋介石、黄郛会见有吉明，蒋与有吉明进行会谈；2月2日，蒋介石向中外记者发表中日亲善方针的声明；2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首次单独会见《朝日新闻》特派员宫崎世龙；2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2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广田在日本议院声称“对蒋介石氏之真意毫不怀疑”；5月17日中日两国外交当局发表中日两国互派之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公告；6月10日，南京政府发表献媚日本、压制抗日的“睦邻敦交令”。

松本重治对于以王宠惠访日为契机的中国政府“开展对日外交”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在书中列有专章详加叙说。在荷兰担任国际法庭法官的王宠惠，1935年2月由上海归任途中，受蒋介石、汪精卫的委托访问东京。他以事实上的中国政府特使身份与日本政府首相冈田启介、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林銑十郎、海相大角岑生、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军事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等高层首脑进行会谈，还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他在东京当面向广田表明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三项原则，尔后被著称为“王宠惠三原则”。尽管作者当时并无机会亲自参与上述种种活动，然而他借助有利的新闻通讯和情报资源，得以洞察其中内情，写出来的回忆录依然是颇为充实和丰富。

蒋汪政府上述对日一系列政策举措，在作者的笔下被概括为“对日新政策”。事过几十年之后，他依然对这个政策称颂不已，而在本书中详加评述。竭力实施“广田三原则”，以推行“水鸟外交”称著于世的驻华大使有吉明，对于蒋汪的“对日新政策”甚为赞赏，认为这是“日中关系好转”的“一个千载难遇的良机”，为此不惜与军方的鹰派人物和外务省中的一部分人展开唇枪舌战。作者对有吉明“水鸟外交”推崇备至，用不少篇幅予以充分叙述，大加赞扬。有吉明1935年3、4月间连续三次赴南京与汪精卫会谈，



回东京述职时在外务省干部会所作的报告,5月间为河北事件向广田提出的建议等等,无不占了这本回忆录的重要位置。

《上海时代》原稿中册,叙述的是华北事变到西安事变这个期间的中日关系,以及两国相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情形。按照作者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逻辑,他首先忆述了所谓“二元化的对华外交”:日本外务省和驻华使馆的“中日合作论”和“对华亲善政策”,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的“弱化南京中央政府”和对华“强硬政策”。前者以广田弘毅和有吉明为代表,后者以关东军和天津军的鹰派军官土肥原,以及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等人为代表。作者为此具体描述和抨击了“矶谷、土肥原两少将的中国观与政策”,摘录了关东军1935年3月作出的《对华政策》文件。作者本人始终赞同、支持广田和有吉明的对华政策,也对竭尽全力推导“对日亲善政策”的汪精卫怀有深深的敬意。这年6月20日作者在南京首次单独采访汪精卫,以倍感敬佩的心情倾听汪氏大谈“中日站在共同利益上进行发展”,并发出了独家新闻。并且,对于有吉明、石射猪太郎与汪精卫、唐有壬双方所谓“顺利”解决上海《新生》周刊事件,说成为“有吉外交生涯精彩一页”而写入本书之中。

接着,作者忆述了“广田三原则”形成的背景和经过,中日两国政府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的初期交涉。文中追溯日本政府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自1935年6月至10月间多次协调和拟订“对华政策”,最终由内阁会议通过了《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及其《附属文书》,“广田三原则”正式形成。作者表示他以为这个文件规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只不过是一个梦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是对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轻视”。而且,作者认为“广田三原则”恰恰违背了广田本人的初衷。这个看法很值得读者们细细品味和辨识。

围绕“广田三原则”的中日初期谈判,在东京主要是由中国

驻日大使蒋作宾与广田弘毅之间进行的，在南京由汪精卫、唐有壬与有吉明之间进行；作为前奏，是唐有壬6月间在上海与有吉明的秘密会谈。作者根据当时他的了解并参照外务省的工作报告，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历次会谈的情形。唐有壬根据汪精卫的指示，向有吉表示中方的四项主张。蒋作宾与广田在6月至10月间陆续进行五次会谈。蒋作宾作为大使正式向日方申述曾由王宠惠提出过的中国对日三项原则，而广田则首次正式向中方摊牌式地提出了“广田三原则”。会谈进程中的具体情节和双方代表的心态，作者都有不少有血有肉的记载。

日本侵华的重点，自1933年以后就从侵占中国东北转到侵略华北地区。这时，日本的“华北政策”和所谓“华北工作”遂很快演变为导致中日矛盾尖锐化的一个新的焦点。作者当时虽身在上海，但敏锐地觉察到华北问题的紧迫性与严重性，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部回忆录中，这一内容自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写道：“总的来说，我把华北问题定义为日军为保卫‘满洲国’而企图在华北建立缓冲地带的战略政策和中方维护主权要求之间的冲突。”作者把日军建立华北缓冲地带的战略行动分为五个阶段，分段加以叙述：进攻长城一线和签订《塘沽协定》为第一阶段，成立“何梅协定”为第二阶段，签订《秦土协定》为第三阶段，“滦州事件”和“香河事件”直至冀东防共政府成立为第四阶段，关东军和天津军策划建立华北五省“自治政权”为第五阶段。伴随着上述过程，书中还写到中国政府的币制改革与英国之关系，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反对币制改革的声明，冀东停战区问题的争执，蒋介石与有吉明就华北问题举行会谈，日本外务系统与陆军省在华北问题上的分歧等等。

当1936年来临时，中、日两国及其相互关系都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局，作者以“昭和十一年新局面”等等为题，记叙了这个期间纷繁复杂的政局演变。国民党“五大”以后，南京政府对日



政策渐趋强硬，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在内外夹攻中终于失势，蒋介石组成以自己为首的政府阵容，张群、何应钦、蒋作宾、张嘉璈、吴鼎昌等著名的知日派人物组成为政府的核心力量。蒋介石企图以此为避免中日战争作最后努力。作者却借用蒋百里的话，说“这次组阁是亲日派总动员”。接着，作者详细介绍了《朝日新闻》社于年初派遣来华的“中国视察记者团”，在上海、南京、北平、绥远、济南、南宁、广州等地，向蒋介石、黄郛、张群、宋子文、蒋作宾，以及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中央和地方的军政首脑进行访谈的情形，披露这些当权者对新一年时局的主张和他们的心境。并且记述了蒋介石1月底与矶谷廉介的一次会谈，以及后者与英国财经专家李兹·罗斯的两次谈话。在日本方面，“二二六”事件发生之初，作者恰巧赶回东京，有机会实地了解事变的发展及平息经过；对于这次事变对日本政局的影响也有亲身的感受，这些都在本书中有所反映。

“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政府整个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唯军部马首是瞻的广田弘毅内阁在8月间全面确立了日本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从而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奠定了基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当局一方面继续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力求用外交手段首先解决“华北问题”，实现其“分离华北”的目的，并且进而要求中方与之举行“调整国交”的谈判，企图逼迫中国一揽子接受“广田三原则”。另一方面，天津军和关东军加紧实行华北政策，陆军当局增兵天津，关东军策划了“绥远事件”。本书中册的基本内容就是作者根据其所见所闻对上述史事的追忆。

作者首先记述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3月间与蒋介石的谈判情形，前者与新任外交部长张群的单独会谈，以及《朝日新闻》社上海支局长白川威海和南京支局长宫崎世龙采访张群的谈话记录摘要。张群的谈话显示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已趋向强硬，

作者忆述他当时的心态说：“我感到形势紧迫，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丢失时机，日中关系将会陷入无可挽回的地步。”作者接着介绍同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对日政策和南京当局解决两广事变的经过。他当时读到了张群在二中全会上的外交报告和蒋介石的讲话，当即“感到事态正一步步地走向危机”，认为蒋介石“一方面寄予对日和平谈判一丝希望，另一方面，一旦领土主权确实受到明显的侵害，将不惜对日武力抵抗”。

在分述中国政府对日政策变化的同时，作者又详细回顾了广田内阁上台后对外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经过日本政府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的多次谋划，同年8月7日，广田内阁“五相会议”首先决定了“南北并进”向外全面扩张的《国策基准》；随后又召开“四相会议”，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11日，广田内阁有关各省决定了《对华实行策》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作者在当时并未直接见到这些绝密文件，但通过各方面情报信息也有所闻，并结合尔后所见史料，在书中作了不少评析。作者写道：“《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新内容是以《帝国外交方针》为大前提而写的。然而《帝国外交方针》的前提是《国策基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军方案，是海军、陆军统帅部骨干分子把所谓的‘北进论’和‘南进论’结合在一起起草的东西。”书中着重对第一次（1月13日）和第二次（8月11日）华北处理纲要作了比较分析，还记述了日本驻华外务机关与军事机关之间对上述纲要前后态度的变化及其背景。

接着，作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主要由张群和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进行的中日“调整国交”谈判的经过情形。这一谈判从1936年9月8日开始，到12月3日基本上宣告结束，其中包括蒋介石和川越10月8日的会谈，张群与川越举行的八次正式会谈，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举行

